

商 务 印 书 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術

2005 1/ 总 第二十一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6 No.1

中國學術

送金



2005 1/总第二十一辑

主编 刘 东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 年春·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 第21辑/刘东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666-1

I. 中… II. 刘… III. 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221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封面题签 饶宗颐

ZHONGGUO XUESHU

中国学术

总第二十一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66-1/C·129

2006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 × 960 1/16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8 插页 1

定价: 26.00 元

主 编:刘 东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万俊人 (清华大学)

王汎森 (台湾中央研究院)

王晓明 (上海大学)

田浩 (亚里桑那州立大学)

刘东 (北京大学)

宇文所安 (哈佛大学)

张伯伟 (南京大学)

李明辉 (台湾中央研究院)

苏源熙 (耶鲁大学)

杜德桥 (牛津大学)

汪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平原 (北京大学)

周锡瑞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岸本美绪 (东京大学)

姚大力 (复旦大学)

荣新江 (北京大学)

倪梁康 (中山大学)

秦晖 (清华大学)

高毅 (北京大学)

阎步克 (北京大学)

滨下武志 (京都大学)

巴斯蒂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

王邦维 (北京大学)

艾尔曼 (普林斯顿大学)

刘禾 (密西根大学)

瓦格纳 (海德堡大学)

安乐哲 (夏威夷大学)

李伯重 (清华大学)

李零 (北京大学)

杜瑞乐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杜赞奇 (芝加哥大学)

沟口雄三 (大东文化大学)

陈来 (北京大学)

孟悦 (尔湾加州大学)

胡志德 (洛杉矶加州大学)

贺萧 (圣克鲁兹加州大学)

唐晓峰 (北京大学)

钱乘旦 (南京大学)

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

葛兆光 (清华大学)

德里克 (俄勒冈州立大学)

© 商务印书馆 《中国学术》

第六卷

第一辑

- | | | |
|------|-----------------|-----------|
| 执行编辑 | 李四龙(北京大学) | 彭刚(清华大学) |
| | 丁耘(复旦大学) | 岳秀坤(清华大学) |
| | 庞冠群(北京大学) | |
| 通讯编辑 | 戴沙迪(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 古柏(芝加哥大学) |
| | 张伦(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 吴飞(哈佛大学) |
| | 葛以嘉(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 | 扬库(海德堡大学) |
| | 费南山(法兰克福歌德大学) | |
| 助理编辑 | 何恬(北京大学) | 彭姗姗(北京大学) |
| | 朱宇晶(清华大学) | 张江莉(北京大学) |
| | 张慧文(北京大学) | |

投稿地址: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中国学术》

电子邮件: dongliu@pku.edu.cn

或 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网 页: <http://chinascholarship.vip.sina.com>

订购地址:100710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商务印书馆发行部

电 话:63044891 83164425

《中国学术》承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

《中国学术》对来稿一律匿名评审
CHINA SCHOLARSHIP is a peer refereed journal.

卷 首 语

卷首语就像一个学者总会有自己的人格一样,一本学刊也总会有自己的整体形象。正由于这种潜能,一本杂志(尤其是一本民间杂志),才有可能大于其全部发表文章之总和。只是,这种烘托成整体的可能,并不让人沾沾自喜,倒更让人战战兢兢,因为它反过来又意味着,一旦哪家杂志失却了总体的公信力,那么此后不管它还能发表多少文章,即使其中仍不乏好文章,却终不过是些孤零零的单篇文章罢了。

论文栏第一组,集中于古今政治理念的思考。克雷格·卡洪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设想,一反此前对于认同政治或群体凝聚力的宣传,而鼓吹全球社会对于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并盛赞混合、多元和重叠的政治身份。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然应该记取世界主义中许多值得承继的价值,比如对人人平等的认可,以及对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应该试图改善现行的世界主义,因为依据其通常的建构,尤其是其最个人主义的形式,它系统地阻挡了人们的视线,使之看不到人们所依靠的团结体的多种形式,以及这些团结体对那些较少特权和较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排挤的人们的特殊意义。夏洞奇指出,以往多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国家定义刻意排除了“正义”的因素,而异于古典政治思想之主流。在此基础上,著名历史学家 R. A. 马库斯遂以“尘世神学”来诠释奥古斯丁,认为其国家概念是世俗化的。但作者却通过对《上帝之城》中关键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西方学者之解经过程的回溯,提出奥古斯丁虽认识到国家不可能摆脱某种“世俗性”,却亦不主张切断政治生活与信仰、道德的联系;他虽确有某些承认国家之中立性的观念,可

马库斯等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够准确。

下一组聚焦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婚姻问题。阎云翔基于纵向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彩礼收取活动怎样在中国北方农村转变为新郎家庭的财产分割形式,而新娘又怎样取代其父母而成为彩礼的接受者。这种转变经历了漫长的代际协商,而在此过程中,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则为年轻人向父母的索取提供了意识形态辩解。作者强调了个体对于转变彩礼收取的能动作用,认为这是被多数现有婚姻交换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同时也检查了这些个体的特定策略,认为正是由此,个体才实现了其能动性,从而在获得更多婚姻自主权的同时,不是选择放弃收取彩礼的传统风俗,而是选择去创造性地利用它。王跃生立足于基层社会考察,分析了二十世纪三十—九十年代冀南农村婚姻的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变动。作者指出:土改前,主流婚姻行为特征是既要避免村内结婚,又将近村婚姻作为首选,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特征;土改后,婚姻圈并未伴随着私有制的取消和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向,相反倒是村内婚的比例明显上升。土改前,通婚的社会范围基本上循门当户对观念进行,相同经济背景的婚姻比重较高;而土改虽然消灭了财富悬殊的基础,阶级标识却被突出强调,并对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遂将婚姻的门户原则演变为阶级原则,并左右着民众的择偶行为。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成分观念始得淡化乃至逐步消除。

再一组集中于民国时代的跨国互动。对外文化政策作为政府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和普及本国文化的行为,乃是较晚出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特征,或许正因此,才由民国而非晚清开始了这个过程。巴斯蒂借助于原始外交档案的爬梳,还原了民国初年在这方面的短暂尝试。正是这种尝试,至少成功地为欧洲汉学增添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位于巴黎的中国学院,并使民国政府进一步赢得了法国政治精英的积极支持。历法作为文明内部号令步调的准绳,其象征性权威既来自天文,更来自人文,缘此在被迫转型的现代中国,整个国族都势必要被拧上世界时钟的发条。左玉河通过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以及这场激进运动在民间遭到的顽强

抵抗,突显出了中西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失序。也许时至今日才能看得清楚:中国人由此失掉的不仅是原有的文明时间表,还有跟这种时间表息息相通的文化生活步调。

评论栏对翻译作品进行了讨论。段晴指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被认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那语趣正是指今日读翻译作品时所能领略到的“洋味”,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地道的汉语。那么,是什么语言成分令人感悟到所谓“西域之语趣”呢?作者从两部《法华经》中择出三个词汇,从梵汉对译,探讨它们真实的含义,认为这些词汇是在两种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表现出不同的异域韵味。由此可知,西域之语趣实乃异域文化之藤蔓的延续。杨立华指出,中译本《存在与时间》的出版,曾对当代汉语思想及学术产生过令人瞩目的影响,功不可没;然而细细对读,仍可发现此一译本存在着多处漏译和误译,有必要提出建设性的商榷。由此不免令人想起,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部奠基性的作品来说,也许汉语世界应当像其他语种一样,拥有不止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参校的译本。

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学术》杂志从无到有,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包括它的筹备期),仿佛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总体形象。只是,这形象同样并不好玩,反倒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既然无论照编者还是读者看来,只要是拿到这里发表的文章,就应当具备理所当然的学术质量。可惜谁又知道,这种质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需要挤出教学和研究之余的时间去苦苦寻求,不管那剩余的时间原本就怎样少得可怜。

刘 东

2005年9月19日于京郊静之湖

目 录

卷首语	001
-----	-----

论 文

克雷格·卡洪 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	001
夏洞奇 在政治与伦理之间:奥古斯丁的国家概念	029
阎云翔 中国北方农村的个人和彩礼演变	060
王跃生 华北农村婚姻范围变动分析(1930-1990)	
——立足于冀南地区的考察	101
巴斯蒂 民国在对外文化政策上的早期尝试	135
左玉河 拧在世界时钟的发条上	
——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	149

评 论

段晴 西域语趣——读《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随笔	193
杨立华 读中译《存在与时间》札记	211

通 讯

姚大力 对《“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的 两点补正	226
----------------------------------	-----

书 评

王炜(编):《熊译海德格尔》(张小勇)	228
---------------------	-----

孙伟平:《伦理学之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思想》 (毕芙蓉).....	235
皮埃尔·罗桑瓦龙:《公民的加冕礼:法国普选史》 (吕一民).....	240
阿尔贝·雅葛德、皮埃尔·玛南、阿兰·雷诺: 《既没有权威也没有惩罚的教育?》(张伦).....	244
田余庆:《拓跋史探》(侯旭东).....	248
詹姆士·米尔沃德:《嘉峪关外:清代中亚经济、 种群和帝国,1759-1864》(李冠南).....	251
克劳斯·米尔海恩:《样板殖民地胶州的压制与反抗: 1897-1914年中德之互动》(费南山撰/陈倩译).....	256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	260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牛润珍).....	269
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马一虹).....	272

后民族时代来到了吗？

克雷格·卡洪(美国纽约大学)

1989年以来，人们在谈起全球化时往往是兴高采烈的。这些人里有反共的鼓噪者、企业界的精英，也有福山那种黑格尔式的对历史终结之断言的追随者。左派对于全球化的热情不用说了。即便是在反对融合(anti-corporate)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之时，许多人还在那里迫不及待地宣称，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将超越民族国家的模式。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着的民族国家的斗争其实是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之一。¹

很多人热心于追求世界主义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的理想。这便意味着，他们拥护的不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主义口味(这一口味常常使文化成为外在消费的物品而不是内在的蕴涵)；也不仅是混杂(hybridity)的概念，那种概念强调的是不那么严整的边界以及各种包容性很强而又纷纭复杂的认同；更不仅是强调个人对世界上其他所有人的义务的世界主义伦理观。他们同时还赞同，全球满可以变为一个城邦，而广义的人性则可通过民主的公民身份(democratic citizenship)来体现。²这种理想的确很有吸

1 参见蒂莫西·布伦南：《世界是我家：世界主义来到了》(Timothy Brennan, *At Home in the World: Cosmopolitanism No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阐发世界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理论家是赫尔德(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Glob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95)。赫尔德利用了哈贝马斯更为普遍的理论，即后民族格局的理论(例如，《后民族格局》[*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其他许多方法也有同样的目标，但细节不尽相同。反映各种思路的论文集包括《世界主义的民主》(Daniele Archibugi and David Held ed., *Cosmopolitan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95)；《重新想象政治共同体》(Daniele Archibugi, David Held and

引力,不过又是那样难以捉摸。

全球化话语在二十一世纪伊始就不如 1990 年代那么风光了。股市的肥皂泡破灭了,谁也难以保证它的复苏;股值的回升却并没有创造出来就业机会。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宣讲并且实行一种对任何被视为威胁的力量采取预防性侵犯的学说。人们更多地意识到宗教的活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增强,然而不宽容的原教旨主义者似乎也格外地兴盛起来。尽管出现了新的积极干预的学说,但人道主义危机和地方性或地区性冲突却仍然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贫困的魔爪更伸向了数百万的无辜百姓。全球化的阴暗面,从 SARS 到艾滋病,再到妇女买卖、毒品和军火生意,不胜枚举。

如果 1989 年集中体现了(但只是部分导致了)1990 年代的拥护全球化的热情,那么“9·11”事件就象征着(也只是部分导致了)心态的大转折。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没看到它的逼近?“9·11”告诉我们,仅仅是一个新事件或一种恶劣的运动就会决定事态的性质——就好像比如说,恐怖主义正是最根本性的问题,而不是由于把国际性组织和通讯媒介,与地方性的痛苦和脆弱合二为一,而在近来变得具有吸引力了的一种策略。我们最好自问为什么没有看到“它”——全球化的阴暗面,至少它的两面性已经存在?

随着 1989 年以来全球化的发展,人们迎来的是震惊与热情的交替出现。大多数前共产主义国家相对和平的转型——尽管也有困难与混乱——带给人们高涨的热情。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境内民族战争带来的是震惊。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亚洲“小虎”的迅猛发展充满热情,但却被 1997 年的危机吓了一大跳。人们对信息技术情有独钟,将它作为自由沟通与新财富的保障,可是因特网上色情图片与垃圾邮件的泛滥、网络经济的一蹶不振以

Martin Kohler ed.,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Cambridge: Polity, 1988);《世界主义政治:超越民族国家的思考与感受》(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论辩世界主义政治》(Daniele Archibugi ed., *Debating Cosmo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3);以及《设想世界主义》(Steven Vertovec and Robin Cohen ed.,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最后两部论文集收录了我个人的不那么乐观的论文。

及新一波的审查制度都令人大为震惊。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时而因为战争在欧洲爆发或欧盟无法实现有效共同防御和外交政策而减退，时而又被移民所导致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打断。全球民主的幻象也被发生在备受推崇的新兴民主国家的情况打破了，比如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发生的战争，阿根廷纠缠不清的政治、经济崩溃。人们同样对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充满热情，可是当国际社会无法有效解决中非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战争问题而使得这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大家震惊了。

实际上，对于许多积极拥抱全球化的人来说，要紧的是不仅要明确地攻击民族主义，而且还有国家。其所以如此，不仅是由于对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可能存在的支持它的手段，如因特网）信心的增强，而且是受到我们时代的残酷内战和种族屠杀的刺激。时代的阴暗面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告诉人们种族性和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恶果，也同时让大家看到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却因为自私自利的政府拒绝采取行动——有时以国家主权观念为由——而发生。因此，人们不仅给予危机中的“人道主义”干预措施越来越多的支持，而且更为坚信，危机正说明了国家的失败，而主权不过是个错误的选择。³

199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震惊并未能阻止人们的热情。这一点尤为明显地体现在日益流行的对全球化的世界主义设想中。这些设想本身一直包含着种种差异。但是，它们都不同于过于强盛的认同政治或对群体凝聚力（group solidarity）的宣传。它们高奏着人权的凯歌，鼓吹“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对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它们盛赞混合的、多元的与重叠的政治身份。这些设想大多来自政治中间派与温和左派，不过它们与来自强硬右派的新自由主义共享着对国家的轻蔑，因为它们把国家理解为专制的和危险的。在这方面，它们反映出了1960年代冲突中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即新

3 尽管成功的范例不多——例如莫桑比克，但对人道主义干预的热情并未消散。这种热情的高潮迭起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实用主义的计算，而是范围更广的社会想象物与伦理立场的一部分。参见卡洪：〈紧急状态的想象物〉（Calhoun, “The Emergency Imaginary,” in D. Gaonkar and T. McCarthy ed., *Modernity and Social Imaginaries: 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Tayl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rthcoming）。

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失望和普遍的反专制潮流。⁴ 它们既重视多边机构,又重视个人从团体的局促和限制中解脱出来的可能性。不论他们所关注的领域是伦理的、政治的、社会心理的还是文化的,一个更为普世化世界的鼓吹者不仅拒绝民族主义,至少也还拒绝原教旨主义(如果不是一切宗教的话),还最坚决地拒斥种族集团的强硬要求。因此,“9·11”对于世界主义者来说是个尤为沉重的打击。国家安全措施的加强、宗教和种族认同的巩固,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发展道路上令人忧心的退步。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整个现代时期存在着的一种不断加速发展的普遍模式。自启蒙运动以来,或许是自十七世纪以来,对于超越旧的政权形式的热情交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混乱中对团结的诉求,一是构建美好社会的国家行为。“在贯穿着欧洲历史的疯狂的崩溃和复苏的进程交替出现的模式中,人们总是对全球主义充满了希望,似乎它即便不是唾手可得,也一定无需太多努力便可实现,可是在现实中人们却发现,全球主义的理想并未实现,他们仍然在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⁵

当今世界有许多事情让人感到悲观,包括多边机构的危机、反抗的政治集团(包括但不限于民族主义者)以及军事力量被用作解决许多关乎全球不平衡与不稳定问题的手段。不过,本文所关心的并非全球化的阴暗面,也不是它们对于世界主义理想的挑战。我们试图提出一些社会学问题,如世界主义作为一个方案而非理想其意义何在,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等等。我最基本的观点可能就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的,而将两者截然对立会引人误入歧途。⁶ 将世界主义定义为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和

4 这导致了哈耶克式的右派和世界主义的左派在攻击国家问题上的异口同声。在福利国家开始解体时,这种协同的攻击大大削弱了福利国家的防卫。对国家怀有的敌意又受到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的愿望的刺激。正如蒂莫西·布伦南所指出的,“对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的攻击是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的翻版。因为,除了种族纯粹主义者和右翼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是唯一在全球贱民(global subaltern)的时代仍然维护民族国家主权的人……”参见《世界是我家》,第301页。

5 布伦南:《世界是我家》,第139-140页。

6 如梅尼克所主张,“现代观念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感情视为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互不相容的两种思想。这一观念无法说服具有对事实更为深刻洞察力以及历时性思

其他集团性 [solidarities]) 的对立物不仅会导致社会学意义上的混乱, 也会阻碍更大民主和更完善的跨国机构的实现。我认为, 虽然民族主义的方案并不一定都好, 但它的存在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质疑, 我们是否真的在进入一个后民族时代?

一、超越民族国家?

世界主义的全球秩序的鼓吹者们常常视之为对民族国家的超越。例如, 尤尔根·哈贝马斯就写到过“后民族格局”(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⁷ 马丁·科勒 (Martin Köhler) 看到了“从民族国家的到世界主义的公共领域的发展。由于一些人的社会活动和他们的全心襄助, 世界正在发展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这些人所共享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包括人权、民主参与、法治以及保护世界的生态遗产。”⁸ 科勒当然承认全球范围内的权威结构尚未充分建立; 他是一个温和的世界主义者, 并未完全抹杀国家的作用。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则更为极端。在他描绘的“后民族主义的政治”中, “世界主义的方案与民族国家的方案发生冲突, 进而取而代之。”⁹

其他许多人也讨论过威斯特法里亚国家体系 (主要是指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出现的国家主权和国家间相互承认的观念) 的终结。¹⁰ 威斯特法里亚

维的人……”参见《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Friedrich Meinecke,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National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第 21 页。

7 哈贝马斯:《后民族格局》。

8 〈从民族的到世界主义的公共空间〉(“From the National to the Cosmopolitan Public Sphere,” in Archibugi, Held, and Köhler ed.,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第 231 页。

9 贝克:〈现代性第二阶段的社会学〉(Beck, “Sociology in the Second Age of Modernity,” in Vertovec and Cohen ed., *Conceiving Cosmopolit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 参见, 例如林克莱特:〈后威斯特法里亚时代欧洲国家中的公民身份与主权〉(Andrew Linklater,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Westphalian European State,” in Archibugi, Held, and Köhler ed., *Re-Imagining Political Community*)。

条约可能是最容易被当作是向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模式转型和国际间处理国家主权的方式之发展过程的标志了。不过,威斯特法里亚条约常常令人夸大了1648年时民族国家已然成为有效且独立的权力实体的程度,那在后来的三个半世纪中成为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首先,此后的300年间,帝国依然存在,尽管更多地是在海外,而不是欧洲大陆自身。其次,1648年时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即便在欧洲亦远未成型。所以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1648年之后,民族国家的方案逐渐开始影响历史的发展,在国内是使得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的努力,在国际上则是有组织的发生冲突和实现和平的行动。实际上,国内与国际之分正是这些行为的结果;1648年时这一区分只在最小程度上得到阐发,而此后数百年间,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远非简单的对立。¹¹

民族国家的概念到十九世纪开始逐渐在欧洲和南北美洲明晰起来,进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主义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蓬勃发展起来,而且要使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合理化的努力直到二十一世纪仍很积极。实际上,中亚、巴尔干、中非和南亚地区的冲突不仅反映了历史的恩怨,而且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冲突与欧洲最初出现现代国家之时代的冲突的性质并非截然不同。宗教、文化、语言、亲属关系、蛊惑人心的政客、经济投机分子当时在欧洲同样与对政权、领土和主权的追求交织在一起。欧洲人甚至将问题搞得更复杂,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巩固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却又在寻求海外扩张。法国被多数民族主义理论奉为模范国家,可是统一这片六边形疆域并非仅仅是通过地方战争和国家的权力。即便是在她最革命、最民族主义的时候,法国依然是个帝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压制海地独立,正如第四、第五共和国压制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因此,威斯特法里亚秩序观轻易地将帝国边缘化了,同时也让人们忽视了在试图使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和垄断武力的主要组织单位的过程中出现的

11 艾歇:《民族主义的背叛》(Micheline Ishay, *The Betrayal of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